

# 中英庚款會的文教事業

周琇環

## 摘要

中英庚款會成立於民國20年4月8日，其職責在於以英國庚款為基金，投資於國民政府的鐵路、電氣、水利等實業，再以利息所得挹注教育文化事業。

該會對抗戰前後國民政府的文教事業貢獻很大，例如：一、為國育才方面：舉辦九屆留英公費考試，為國家培養出193名各學科領域的專業人才。二、贊助戰時的教育事業：曾補助許多大學或研究機構；安頓戰時流亡的科學研究人員及大學教授；搶運古物、搜購善本書，使文物不至於流失國外；配合國家政策致力於西北開發等等。三、曾接受英國庚款補助留學的李國鼎先生認為：「中英庚款會的教育政策帶動了留英風氣，使當時的留英人數增加。」

若不是受戰亂影響，造成庚款息金收入的作業系統失效，相信以該會擘劃執行的能力，對於各項文教事業必有更可觀的成果。

**關鍵詞：**中英庚款會、西北科學考察團、公費留英、李國鼎、錢鍾書

#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Sponsored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AIFBG

Hsiu-huan Chou<sup>\*</sup>

## Abstract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demnity Funds remit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established on April 8th, 1931, was meant to invest fo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n construction projects such as rails, electric systems and water conservancy, trying to work further on education and culture projects with the interests earned in the banks.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AIFBG did a lot of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e as well as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 would like to cite some examples: (1) Education: They held 9 Scholarship Examinations of the Board to England, thereafter training up as many as 193 professionals in various fields. (2) Sponsorship to education/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second world war, man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were partly subsidized by the Board, helping to settle wandering research scholars and professors. A lot of antiques and ancient volumes were collected and properly stored so that these precious materials did not have to be sold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 Board in conformity to the national policy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mpoverished Northwestern areas.

K.T. Li(李國鼎), who once accepted the financial sponsorship from the Board said: "Due to positive influence caused by th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y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AIFBG, it turns out to be a fashion to go to England for further study. 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s who would like to study in England has been greatly on the rise."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wars, which caused the failure of the operational system of returning good interests,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AIFBG with the solid ability in planning and rendering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would have made a lot more contributions to various types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Key words:** Board of Truste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demnity Funds remitted by British Government, North-western Scientific Expedition Group, Government sponsored Screening Examination to England, K.T. Li, Chung-shu Chien

---

\* Associat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 中英庚款會的文教事業

周琇環\*

## 壹、前言

根據1930年中英雙方的換文，英國決定將1922年以後中國應付之庚款，除了約定用途之外，全數退還中國政府管理。1931年4月8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以下簡稱中英庚款會）<sup>1</sup>正式成立於南京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首任董事長由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兼任，董事會負責處理日常事務的事務所則於1933年秋設立於南京山西路78號。<sup>2</sup>隨著時代的變遷，1950年1月6日英國承認中共政權後，中英庚款會決議結束業務，1958年5月2日，經行政院核准後而結束所有會務。<sup>3</sup>

中英庚款會在朱家驊的主持下，對國家建設及教育文化等方面，曾有許多令人稱述的貢獻。特別是其文教事業，根據《教育年鑑》的評比，認為除中基會之外，各國庚款以中英庚款會的教育事業收效最宏。<sup>4</sup>中英庚款會的會務，既是以庚款為基金投資於政府各部會，再以所得利息作為該會教育文化事業之經費，可見得中英庚款會各項事業所著重者，就是教

---

\* 國史館協修

<sup>1</sup> 周琇環：《中英庚款的退還與運用》（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87年6月），頁120。「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名稱，最早於1931年3月28日國民政府公布的章程中稱為「管理英國退還庚款董事會」，二天後在所公布之董事任命令中，又稱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經董事長朱家驊於4月14日呈請國府劃一該會名稱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之名稱，遂於4月18日確定下來。

<sup>2</sup> 由張朋園、沈懷玉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1925-19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6年出版），頁446-453；文教基金會呈行政院為結束保管請核備文（民國四十七年三月十七日），《朱家驊檔案》，附件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檔案，檔號：第82函，可知中英庚款會董事長自始至終皆由朱家驊擔任。

<sup>3</sup> 關於中英庚款會結束會務的細節，參見周琇環：《中英庚款的退還與運用》，頁157-158。

<sup>4</sup> 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臺北縣：文海出版社翻印，民國75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1輯），第15編雜錄，頁65、77。

育文化事業，自然收效會較佳。該會對於抗戰前後國民政府的文教事業所作的貢獻，頗具歷史意義，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分析。

本文將先討論中英庚款會教育經費的來源以及可資運用的數額，繼則說明抗戰前後該會補助文教事業的原則與內容，再分析探討中英庚款會文教事業對時代的貢獻。

## 貳、中英庚款會的教育經費

英國決議退還庚款的總數，本息共 11,186,547 鎊 13 先令，<sup>5</sup> 依據當時匯價 1 英鎊約合 20 銀元計算，約共 236,000,000 銀元。<sup>6</sup> 中英庚款會成立後，陸續收到的「到期款項」，一半由駐英公使交予中英庚款會運用，另一半交倫敦購料委員會併作料款（依規定料款非購料不得動用）。「到期款項」約共 7,660,000 餘鎊，受 1939 年 1 月起我國停付庚款影響，實際收到英金 3,805,255 鎊 10 先令 4 辨士。連同「積存款項」，共計 7,369,877 鎊 16 先令 11 辨士可資運用，這筆經費就是中英庚款會歷年來所運用的基金總額。<sup>7</sup>

中英庚款會所管理的基金用途，須依照換文規定，借充整理建築鐵路及經營其他生產事業的經費，再以借款利息採週年五厘計算，獲得的息金才用作補助教育文化事業的經費。換言之，中英庚款會的教育經費係來自各借出基金的利息收入。而利息收入的運用方式，則依 1931 年 7 月 4 日中英庚款會第四次董事會議議決通過之「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標準」，為運用的主要依據，<sup>8</sup> 故而，「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標準」是為該會興辦教育的準則。

### 一、息金用途支配標準

1931 年 8 月 10 日，「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標準」經行政院備案後正式生效。<sup>9</sup> 該項

<sup>5</sup> F.O.405/244 [F 739/174/10], No.30 Treasury to Foreign Office, p.76. 當時 1 英鎊=20 先令。

<sup>6</sup> 楊仲揆：《中國現代化先驅 朱家驊傳》（臺北：近代中國雜誌社，民國 73 年 1 月，初版），頁 185。

<sup>7</sup> 中英文教基金會呈請行政院核備結束保管處，〈朱家驊檔案〉，附件二，管理中庚款董事會，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藏，第 82 函。

<sup>8</sup> 此支配標準於同年 8 月 10 日由行政院備案成立。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年 8 月，臺二版），頁 249；《教育雜誌》，23 卷 10 號（民國 20 年 10 月 20 日），頁 104。

<sup>9</sup> 庚款用途劃撥（民國 20 年 7 月 29 日），〈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882.10/0047.01-03。

息金用途支配標準的內容如下：

一、運用原則：(一)中英庚款息金，以用於有永久紀念性之教育文化之建築，及有關全國之重要文化事業為原則，不得用以補助任何機關之經常費及臨時費。(二)中英庚款息金應兼顧中央及全國各文化中心，作適當之支配，務使事業集中，效果普及，以補國內教育文化之不足。

二、用途之規定：(一)關於永久紀念性之教育化建設，包括：1.屬於中央者 建設大規模之中央圖書館及中央博物館。2.屬於全國文化中心者 分期補助國內成績昭著之各高等教育及研究機關必需之校舍建築費或設備費，並補助國內固有文化史蹟古物之保存。3.屬於各省者 分期於各省建設模範中小學或中等農業學校一所，此項分期建設應先就僻遠省分著手，逐漸普及全國。4.屬於特殊教育之建設 分期在全國大工業中心，建設中等工業學校。(二)有關全國之重要文化事業者：1.設置中小學教科書獎勵金 凡成績特別優良之中小學、中等農工商學校的教科書，得給與獎勵金。2.設置出版物獎勵金 獎勵高深著作及譯作之出版，尤注重於高等教育用之教科書及參考書。3.設置出國留學名額及國外教育補助費等。<sup>10</sup>

總之，根據以上支配原則，中英庚款會實際上贊助的教育文化事業，包括：一、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館的建設；二、補助成績優良的高等教育及研究機關之建築費；三、建設模範中小學、農工職業學校、助產學校及興辦農村教育；四、獎勵專門著作及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五、考送留英學生。而各項事業分配所得的息金（除抽提該會經常費百分之一，再提存準備金百分之一外），按照下列比例施行於各類事業：第一類25%、第二類35%、第三類24%、第四類1%、第五類15%。該會歷年息金收入，均陸續於抗戰前後各支配四次，總數達1,090,000餘元。<sup>11</sup>至於中英庚款會教育建設的程序，係先就僻遠、內地省分教育最不發達的地方著手，漸次擴展至各其他重要地區。<sup>12</sup>

從以上的息金支配的情況來看，中英庚款會對於基金運用的策略，係力求集中資助以達到效果的方式來運作。息金集中資助於博物館、圖書館、高等教育、研究機關、中小學和職

<sup>10</sup> 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民國外債檔案史料》，第12卷（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581-582；庚款用途劃撥，《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882.10/0047.01-03。

<sup>11</sup> 本會會務摘要（民國36年3月6日），《朱家驊檔案》，附件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檔號：第4函。

<sup>12</sup>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53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60年12月），頁460-466；王聿均、孫斌合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6年5月，初版），頁399-406；王樹槐：《庚子賠款》（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4年5月，再版），頁474-475。

業學校教科書、留英公費生等事項上。學科方面，側重理農工醫。在地域方面，注重僻遠和內地省分。這些正是抗戰前後急待資助的教育事業。可惜，受抗戰軍興時局突變、鐵道部率先與中英庚款會商訂「非常時期延付本金辦法」，以及其他借款機關紛紛仿效等因素的影響，使原本的息金運用機制遭受破壞，各機關積欠息金不復能如以前的按時償還，<sup>13</sup> 終而導致中英庚款會文教事業的停滯廢弛。

## 二、歷年息金收入支用情形

中英庚款會於初成立之時，便接獲許多申請補助的案件。第一年國內部分基金無多，借出庚款亦少，故息金收入不能立刻補助，直至第四年始作第一次支配運用。<sup>14</sup> 嗣後，現款、料款陸續借出存款隨之增加，利息收入則與年俱進。中英庚款會歷年利息收入確實數額，詳列如下表：

表一：中英庚款會歷年利息收入數額

年度	息金收入	年度	息金收入
1931年	48,507.40元	1943年	9,469,138.62元
1932年	315,944.97元	1944年	10,170,973.73元
1933年	1,384,475.60元	1945年	16,872,761.42元
1934年	1,828,950.20元	1946年	4,728,800.09元
1935年	3,389,087.84元	1947年	12,789,970.42元
1936年	4,393,627.48元	1948年(6月)	(以上為國幣) 427,072,702.99元
1937年	4,160,947.91元	1948年下半年	(金圓) 1,064.31元
1938年(7月至12月)	1,549,427.80元	1949年	(金圓) 126,156.20圓
1939年	3,520,587.03元	1950年	(新臺幣) 28,141.83元
1940年	3,741,368.42元	1951年	(新臺幣) 23.35元
1941年	2,301,030.86元	1952年	(新臺幣) 9,768.75元
1942年	3,913,114.90元	1953年(至1958年3月)	(新臺幣) 196,034.70元

資料來源：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歷年財務概況，《朱家驊檔案》，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藏，附件二，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第81函。

<sup>13</sup> 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歷年財務概況，《朱家驊檔案》，附件二，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第81函。

<sup>14</sup> 本會會務摘要（民國36年3月6日），《中英庚款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第4函。

以上共計國幣 511,651,418.68 元，金圓 127,220.51 元，新臺幣 233,968.63 元。

中英庚款會息金收入，依照董事會議決議，應提撥部分作為董事會及事務所經費暨教育文化準備金。所謂教育文化準備金，自1933年度始就每年實收利息內提存準備金，俟積存至200萬元以上時即暫停繼續提存，計1933年度起至1942年度止，共提存國幣2,367,699.81元。董事會及事務所的經費，則是按每年實收利息數額中提撥百分之十充作董事會及事務所經費，昔年物價平穩開支較省，所提經費年有剩餘，及1942年度起物價波動甚大，開支激增，預算以外之非常開支又時有調整，支出尤鉅，加之息收銳減，每年所提經費不敷甚多，所有不敷之數，經依照董事會議決議，就收到利息內可儘先提用。自1933年度起至1945年度12月止，共撥付國幣17,794,849.78元。<sup>15</sup>

中英庚款會舉辦教育文化事業時資金運作的方式，是以上年度的息金收入，供作下年度事業所需經費。最初二年內，中英庚款會因為息金累積甚少，可堪使用的資金不足，故而未能補助各教育文化機關，僅於1933年度開始考送留英公費生赴英留學，成為該會興辦教育文化事業之嚆矢。及1934年度，息金始積有相當成數，中英庚款會迺依照董事會議所決議的支配標準，開始贊助民國的文教事業。總之，歷年來所有補助於教育文化事業的實支類額詳如下列各表（表二至表四）：

表二：抗戰前中英庚款會之文教事業補助費（單位：國幣元）

項目	年 度	1934 年	1935 年	1936 年	1937 年
甲類	中央圖書館及博物館建築費保存國內固有文化史蹟古物補助費	300,000.00	300,000.00	700,000.00	0
乙類	補助國內各高等教育及研究機關建築費或設備費及設置講座費	385,000.00	420,000.00	968,000.00	496,480.00
丙類	考送留英公費生經費及補助國內教育事業費	(59,077.92) 208,653.88	277,015.04	422,062.43	480,237.84
丁類	設置中小學教科書獎學金	12,000.00	12,000.00	0	0
戊類	建設模範中小學中等農業學校或興辦農村教育暨建築工業學校	424,000.00	424,500.00	780,000.00	621,519.83
	其 他		130,000.00	46,014.10	283,000.00
	總 計	1,329,653.88	1,653,515.04	2,916,076.53	1,881,237.67

資料來源：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歷年財務概況，《朱家驊檔案》，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藏，附件二，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第81函。

<sup>15</sup> 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歷年財務概況，《朱家驊檔案》，附件二，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第81函。

表三：戰時中英庚款會文教事業經費表

項目年度	1938年(7-12月)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補助事業	772,190.00	988,525.00	1,963,417.48	742,363.15	788,122.27	448,781.48	補助各大學講座費 639,317.71
留學經費	252,068.27	369,696.11	414,310.10	219,760.57	143,955.05	244,431.88	561,913.15
甘肅科學教育館 及補助西北教育 經費	35,000.00	102,500.00	119,560.00	206,600.00	264,900.00	1,270,532.00	1,152,786.00
各中學經費	40,360.00	180,115.00	476,003.80	1,617,765.00	1,596,829.00	6,401,074.72	7,477,883.00
協助科學工作人 員經費	57,238.11	184,314.81	256,282.92	178,236.20	284,013.15	198,068.13	26,454.90
川康考察團經費		63,328.53	17,014.79	7,058.36	50,000.00 改為「西北史地 考察團」經費		300.00 補助研究生經費
各研究所經費		60,000.00	134,980.00	581,324.00	763,732.00	2,150,504.00	3,806,720.00
小計	384,666.38	959,954.45	1,418,151.61	2,810,744.13	3,103,429.90	10,264,610.73	13,126,057.05
總計	1,156,856.38	1,948,479.45	3,381,569.09	3,553,107.27	3,891,552.17	10,713,392.21	13,765,374.76

資料來源：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歷年財務概況，《朱家驊檔案》，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藏，附件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第81函。

表四：抗戰勝利後中英文教事業經費表

年度	項目	自辦事業	考選留英公費生經費	各研究所經費	補助事業	備註
1945年(1,2月)				2,305,220.00		國幣
1945年(3-12月)		29,914,302.68	1,973,401.68	27,940,901.00		國幣
1946年		53,228,942.30	1,144,842.30	50,084,100.00	2,000,000.00	國幣
1947年			169,474.56		13,050,684.85	國幣
1948年(1-6月)			173,173.93		2,052.46	國幣
1948年(7-12月)			311,310.00		42,067.61	金圓
1949年			288,013.99 (1-6月,金圓)		1,000.00 (7-12月,銀元)	
1950-51年			35,971.89			新臺幣
1952年					25,507.00	新臺幣
1953年			23,958.15			新臺幣

說明：1954年至1958年3月，尚餘1,088,611.15元新臺幣。

資料來源：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歷年財務概況，《朱家驊檔案》，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藏，附件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第81函。

根據中英庚款會的統計，歷年補助各類事業及自辦事業實支數額，總計國幣 241,273,045.19 元，金圓 641,391.60 元，銀元 1,000 元，新臺幣 1,174,048.19 元。<sup>16</sup>

從上列各表，我們可知中英庚款會的教育文化事業經費運用情形。以 1936 年為例，1936 年度國家總預算中，歲出教育文化費總計 44,339,962 元，<sup>17</sup> 而中英庚款會的教育文化經費支出卻有 2,916,076.53 元，占全國教育經費的 6% 強，可見其對國民政府文教事業的贊助，可謂不無小補。其次，在各國退還的庚款中英國原非最多，但是由於法庚款大部分充作中法銀行的基金、俄德庚款於歐戰後完全取消、美國將部分庚款專作建設清華的經費，所以，相形之下，英國庚款可供運用於教育文化的經費顯然較多，因此我國各教育文化機關受益於英國者占較大的比例。<sup>18</sup>

### 叁、抗戰前對文教事業的補助

誠如前述，中英庚款會自成立至 1938 年底，收到所有款項達七百三十六萬九千餘鎊（包括購料款項），約占退還全額的三分之二弱。這筆經費即截至 1949 年中英庚款會所有可資運用的款項。起初幾年先以款項借於生息，大部分工作是生產建設方面。後來隨息金之增加，逐漸轉而加強教育文化事業。以下以抗戰爆發為分期點，論述該會對我國文教事業的各項貢獻。

抗戰前中英庚款會的教育文化事業，包括 1. 保存古物與興建博物院圖書館；2. 高等教育和研究機關的補助；3. 考選留英公費生；4. 對教科書的贊助；5. 教育機關的補助等五類。

#### 一、保存古物與興建博物院圖書館

關於興建中央圖書館及博物館方面。1933 年，中央圖書館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成立之時，正值「一二八事變」後，政府財政困窘，此兩機構並無開辦經費。中英庚款會董事長朱家驊，當時身兼交通部長、教育部長兩職，他先以交通部歸還基金，每月補助中央圖書館 2,000 元、中央博物院 3,000 元。嗣因 1934 年中英庚款會決議撥付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館

<sup>16</sup> 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歷年財務概況，《朱家驊檔案》，附件二，管理中庚款董事會，第 81 函。

<sup>17</sup> 二十五年度之中央教育文化費，《教育雜誌》，26 卷 9 號（民國 25 年 9 月 10 日），頁 130。

<sup>18</sup> 本會會務摘要（民國 36 年 3 月 6 日），《中英庚款檔案》，檔號：第 4 函。

建築費各150萬元，藉由這筆經費，中央博物館完成南京中山門內的館舍建築，與中央圖書館於南京覓定的館址。中英庚款會原擬於補助中央博物館、中央圖書館後，逐漸在全國各重要都市建築博物館各一所，惜抗戰軍興，導致中英庚款會收入銳減，而無法實現。中央圖書館在抗戰前經中英庚款會的補助，圖書數量即由初期的40,000冊增至200,000冊。<sup>19</sup>

保存古物的事項上，中英庚款會自1936年度起撥付300,000元於開辦工作，如1.發掘研究史跡古物；2.修理防護史跡古物；3.收購古物及藝術品，曾組織委員會專司其事。<sup>20</sup>

## 二、對高等教育和研究機關的投資

關於補助高等教育及研究機關者，大略分為建築、設備、講座三項。戰前國內專科以上學校，無論國立、省立、私立多受過補助。研究機關方面，其主要院所亦均經支配補助。<sup>21</sup>

以1934年為例，受中英庚款會補助之國立大學有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北洋工學院、上海醫學院；私立大學有南開大學、燕京大學、廈門大學，湘雅醫學院、遼寧醫學院；研究機關有國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國立編譯館、中央衛生實驗處、中國營造學社，及中英文化協會等。<sup>22</sup>

1935年起，受補助之第二類教育機關，除上述各大學及機關外，尚有省立雲南大學、省立廣西大學等。1936年新受補助之學校機關，國立大學有山東大學、四川大學、交通大學、北平大學醫學院、同濟大學醫學院；省立大學有河南大學、甘肅學院、浙江省立醫學專校、江西省立醫學專校、山西省立工業專科學校；私立大學有金陵大學、嶺南大學孫逸仙博士醫學院、南通學院、焦作工學院、華北工程學校、華西協合大學、齊魯大學；研究機關有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中華職業教育社、禹貢學會、中國工程師學會等。<sup>23</sup>

<sup>19</sup> 蔣復璁：朱驩先對於中國圖書館及博物館的貢獻，《朱驩先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民國68年），頁83-84；蔣復璁：朱驩先先生對中國文化教育之貢獻，《傳記文學》，29卷6期，頁2-13；周琇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史料選輯，《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4期（民國82年6月），頁319。

<sup>20</sup> 《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民國14年7月至25年10月），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藏，頁208；Cornell University owned,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demnity Funds Remit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r the Period Jan. 1 to June 30, 1936, p.11.

<sup>21</sup>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2。

<sup>22</sup> 《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頁108-210；《民國外債檔案史料》，第12卷，頁779-782。

<sup>23</sup> 《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頁210-212。

### 三、考選留英公費生

丙類是關於考送留英公費生方面，至1936年10月止，曾舉辦四屆公費留英考試，計錄取79名。各屆考選之留學生人員、學科、返國後簡歷，敘述如次：

第一屆留英公費生考試經1933年6月5日第16次董事會議議決辦理，自7月15日登報招考，至8月16日止，總計216人投考，僅錄取王葆仁（工業化學科）、林兆耆（熱帶病學）、李祁小姐（英國文學）、錢清廉（法律）、石漢聲（生物）、周傳儒（西洋史）、戴克光（政治）、顧學勤（臨床病學）、吳大任（數學）等9名。于9月5日由滬放洋，留學時期限定三年。<sup>24</sup>

其中王葆仁於1935年得英國倫敦大學皇家科學哲學博士，翌年回國後，任教於同濟大學及浙江大學等；1959年時，創刊《高分子通訊》，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林兆耆曾在利物浦大學熱帶病及衛生學院實習半年，取得畢業證書，後在倫敦各教學醫院實習進修，1936年11月回國，被聘為上海醫學院內科學講師，之後一直間或任教於該醫學院。石漢聲於1933年10月，入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植物生理研究班為研究生；三年後取得英國倫敦大學植物生理哲學博士及帝國理工學院學位榮譽證書；回國後任教於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廣西同濟大學、四川樂山武漢大學等。周傳儒於1937年自劍橋大學畢業歸國，歷任西北大學、山西大學及東北大學教授兼史學系主任。<sup>25</sup> 根據以上4名公費生的資料得知，第一屆共計4名自英國取得學位或實習證書，其中2名是博士。回國後，4名全數從事教職，且有1名（王葆仁）出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相當於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1934年7月，中英庚款會舉辦第二屆留英公費考試。有一首詩載於李國鼎先生所收藏的字畫上，詩文稱：「名成身未老，立言得上道，靜者意有餘，富貴非所好；君爽舊相識，功業玉山顯，同年廿六人，惟君申懷抱；力侔分社稷，復漢仗師保，海外小蓬萊，十年成豐鎬；為竟中興功，神賜恆春草，三傑君獨健，天下為君禱。」（國公資政雅屬 晚黃崑巖書，壬申年夏）其中「同年廿六人，惟君申懷抱」乙句，指的就是中英庚款會考選第二屆的26名留學生之事。

<sup>24</sup> 「第一屆留英公費生考試案」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半年刊 第5期（民國22年12月），《朱家驊檔案》，附件二，中英庚款會第20函。

<sup>25</sup> 《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頁207； 文教補助、公費生雜支，《朱家驊檔案》，附件二，中英庚款會第42、44函，檔案原件；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頁89、151、465、531；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285。

本屆錄取陳永齡、董鍾林、夏堅白、王之卓（以上大地測量4名），丁驩、林超、袁壽椿、鍾道銘（以上地理4名），朱應詵、李國鼎、錢臨照（以上物理3名），周宗蓮、張有齡（以上土木工程水利組2名），邵象華、丘玉池（以上冶金2名），吳在東、何琴蓮小姐（以上醫學及公共衛生2名），周鴻經、唐培經（以上數學2名），童大墳（土木工程鐵道組），柯元恆（機械工程），林致平（航空工程），陳宗惠（造船），楊人榘（西洋史），俞大綱（英國文學，俞大維的妹妹），伍啟元（經濟）共26名。<sup>26</sup>

據李國鼎的說法，該屆學生雖因英國的大地測量學的設施不足無法就學研習，但中英庚款會的留學規定十分富於彈性，所以大地測量科的4名，後來轉至德國學習。民國85年時，董鍾林、夏堅白、林超、袁壽椿、鍾道銘、周宗蓮、丘玉池、林致平，唐培經皆已過世，朱應詵曾在臺灣東海大學教書，亦已過世。<sup>27</sup>

第二屆學而有成者，包括：陳永齡於1935年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後轉赴德國留學，1939年獲得柏林工業大學工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任教於清華大學、同濟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及任職於交通部等。夏堅白，畢業於同濟大學，考取留英後，入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土木系就讀，1935年8月，赴德國柏林工科大學測量學院學習，1939年8月取得特許工程師文憑及工學博士學位，同年10月返國，歷任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同濟大學教授、校長等職。王之卓，1934年8月赴英留學，在倫敦大學帝國學院攻讀測量學，翌年7月，轉至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後取得工學博士學位；1939年返國，歷任中山大學、交通大學、青島工學院教授，中國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員、測量局主任等職，1996年時已經從武漢測會學院退休。丁驩，就學於Glasburg。林超，1938年於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畢業，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中山大學、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地理系教授，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等職。<sup>28</sup>

李國鼎，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物理研究所，1937年11月返國，當時抗戰已經開始，於是乃參與國民政府的國防工業與國營企業。回國之初，一方面接受武漢大學的聘書，一方面在防空學校任教，當時的防空學校下指揮的兩種防空部隊，即高射砲部隊與照測總隊，此校則隸屬於航空委員會，校長則是航空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之後李國鼎於1953年加入臺灣的

<sup>26</sup> 《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頁207；王煥琛編：《留學教育 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4冊（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69年7月，初版），頁1916。

<sup>27</sup> 卓遵宏訪問、陳進金紀錄：李國鼎先生口述訪問稿（民國85年9月6日上午訪問），未刊稿。該次訪問筆者亦在場。

<sup>28</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36、458-459、661、1019。

工業委員會，歷任美援會、經合會、經濟部部長、財政部部長、及行政院政務委員等要職，一直參與臺灣經濟發展決策工作。<sup>29</sup>

錢臨照，於1935年在英國倫敦大學進行晶體範性形變之研究，回國後曾有許多貢獻，歷任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等物理研究所之研究員及所長。中國科學院於合肥開辦中國科技大學，該校並不隸屬於教育部而是屬於中國科學院，其校長與創辦人是嚴季慈，嚴季慈是前輩的物理學家，是中央大學的前身南京高等師範學院所畢業，並曾至法國留學，回國後曾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職，而錢臨照回國後即至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職，追隨嚴季慈作研究，後嚴季慈作中國科技大學校長，錢即任副校長，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相當於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之職。<sup>30</sup>

張有齡，雖然學的是水利，但後來對學術有貢獻的卻是在地震預測。1996年4月至6月時，受臺灣大學在國科會資助之下的國立地震科學研究中心之邀請，來臺研究臺北盆地的地震情況，1996年退休後定居在美國。<sup>31</sup> 邵象華，於1937年取得倫敦帝國理工學院之碩士學位，1938年返國，先後任武漢大學教授，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專員，及鞍鋼煉鋼廠副廠長等職。<sup>32</sup> 1996年時，在北京鋼鐵學院作研究。丘玉池，回國後在二十四兵工廠作事，約於1960年去世。<sup>33</sup>

周鴻經，於1937年得倫敦大學理科碩士學位，次年返國任教於中央大學、臺灣大學數學系教授，國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及該院數學研究所所長等職。<sup>34</sup> 童大塏，鐵道學院院長之職退休。林致平，曾任空軍研究院院長及臺灣中興大學校長。<sup>35</sup> 楊人樞，1934年7月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世界史，1938年返國，先後任四川大學、西北聯大、

<sup>29</sup> 康綠島：《李國鼎口述歷史》（臺北：卓越文化公司，民國82年9月，初版），序文、頁39；卓遵宏訪問、陳進金紀錄：李國鼎先生口述訪問稿（民國85年9月6日上午訪問），未刊稿。

<sup>30</sup> 卓遵宏訪問、陳進金紀錄：李國鼎先生口述訪問稿（民國85年9月6日上午訪問），未刊稿。

<sup>31</sup> 卓遵宏訪問、陳進金紀錄：李國鼎先生口述訪問稿（民國85年9月6日上午訪問），未刊稿。

<sup>32</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549、1533。

<sup>33</sup> 康綠島：《李國鼎口述歷史》，序文，頁39；卓遵宏訪問、陳進金紀錄：李國鼎先生口述訪問稿（民國85年9月6日上午訪問），未刊稿。

<sup>34</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537；周鴻經先生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1輯（臺北：國史館，民國83年5月，初版），頁150-152；秦孝儀編：《中國現代史辭典》（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4年6月，初版），頁202。

<sup>35</sup> 康綠島：《李國鼎口述歷史》，序文、頁39；卓遵宏訪問、陳進金紀錄：李國鼎先生口述訪問稿（民國85年9月6日上午訪問），未刊稿。

武漢大學、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伍啟元，1934年入倫敦經濟學院，1937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返國任武漢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47年，任聯合國亞洲經濟組組長，1974年春自聯合國退休，改任紐約大學公共行政學教授，1982年秋任臺中東海大學法學院院長，行政院經建會諮詢委員等職。<sup>36</sup>

根據以上15名留英公費生的資料得知：第二屆有7名自英國取得學位、3名在德國取得學位，共計5名博士、2名碩士。畢業後6名任教職，1名（錢臨照）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7名任公職<sup>37</sup>。

第三屆留英公費考試於1935年4月舉行，計錄取錢寶鈞、張承洪、蘇元復、王祖舜（以上紡織），施正信、張毅（以上醫學），吳仲賢、徐紹斌（以上畜牧），謝明山、彭蜀麟（以上工業化學），王德榮、張劍（以上航空工程），楊曾威、程裕淇（以上地理），李華宗、柯召（以上數學），余瑞璜、張文裕（以上物理），楊仁傑、張文治（以上造船），錢鍾書（英國文學），章文才（園藝），朱寶賢（法律），朱延豐（西洋史）等人，合共24名。<sup>38</sup>

本屆中較有成就者包括：蘇元復，於1936年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理工學院就讀，1937得碩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化工系教授，1952年以後，任華東工學院教授、化學工程研究所所長等教職。吳仲賢，於1937年取得英國愛丁堡大學動物遺傳學研究所哲學博士學位，自1940年起，歷任西北大學生物系、西北師範學院博物系、中央大學畜牧獸醫系、北京大學畜牧系教授及主任。<sup>39</sup> 謝明山，1937年取得英國倫敦大學皇家理工學院博士學位，1938年返國後，歷任資源委員會化學工廠工程師、臺灣鱸業公司協理、教育部政務次長等職，並曾任教於西南聯大化工系、中原理工學院及臺中東海大學。<sup>40</sup>

王德榮，於1937年取得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碩士學位，次年返國後，歷任西南聯大、清華大學航空系教授、系主任，北京航空學院教授，航空工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等。程裕淇，1935年赴英留學，後取得利物浦大學地質學博士學位，返國後歷任地質調查

<sup>36</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213、1217。

<sup>37</sup> 任公職者，包括各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或是政府官員等，非從事教育工作者，且以各個學人所出任的最高職位稱之。

<sup>38</sup> 《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頁207；王煥琛編：《留學教育 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4冊，頁1916-1918；文教補助、公費生雜支，《朱家驊檔案》，附件二，中英庚款會第42、44函，檔案原件；《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3，程裕淇作「程裕祺」。

<sup>39</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347、656。

<sup>40</sup> 謝海莉：謝明山先生生平，《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9輯（臺北：國史館，民國82年6月，初版），頁496-499。

所技士、地質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副所長、地質部地質礦產所副所長、地質部副部長等職。柯召，1937年獲得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四川大學、重慶大學執教，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並任四川大學校長。余瑞璜，1937年取得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物理系博士學位，1939年回國，歷任西南聯大、清華大學金屬研究所、北京大學地質系、吉林大學等校教授。張文裕，於1938年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1939年任西南聯大教授，1943年起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普渡大學執教，1956年回中國，任北京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1961年，至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進行高能實驗物理研究工作，1973年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等。

錢鍾書，1929年9月進入清華大學讀書，因為他有一個不尋常的經過—謠傳他入學考試數學才得15分，但中英文特優，經校長羅家倫同意破格錄取，故他初至清華即文名滿全校。<sup>41</sup> 1935年考取英國庚款公費留學，入英牛津大學修習。1937年夏，論文《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通過，獲得副博士（B. Litt.）學位。<sup>42</sup> 1938年10月，應聘為西南聯合大學（原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sup>43</sup> 後歷任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英文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學外語系教授等職。1946年出版短篇小說集《人、獸、鬼》，1947年出版長篇小說《圍城》，《圍城》描寫抗戰時期一群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透過書中主人翁坎坷的際遇和不幸的愛情，暗示現代文明背景下人生的困境。1948年出版詩論《談藝錄》，書中引進西方文論來評比中國詩與詩論，為傳統的詩話文類開闢了新的一面。大陸淪陷後，他不再著述而專事文獻的英譯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錢氏備受摧殘，1969年被下放勞改。直到1978年錢氏赴義大利出席歐洲漢學會議，才知道其所著《圍城》一書，被譯為法、俄、捷三國文字，已成為世界性的文學著作，1979年錢氏赴美訪問，在美國學術引起一陣「錢鍾書熱」。1982年錢氏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sup>44</sup>

章文才，1937年自英國倫敦大學果樹研究所畢業，取得園藝學博士學位，1938年回國後，歷任金陵大學農學院、西北農學院、武漢大學農學院、華中農學院教授，及全國人民代

<sup>41</sup> 湯晏：《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民國90年12月），頁66，謂錢鍾書數學考零分。戎一生：《錢鍾書先生生平述略》，收入陸文虎編：《錢鍾書研究采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92年11月，第1版），頁392，則說錢氏數學考15分。

<sup>42</sup> 湯晏：《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頁148、156、162、170。當時英國牛津大學規定中英庚款留學生必須讀B. Litt.學位。牛津B. Litt.學位相當於美國學制的Master of Philosophy（M. Phil.），有人譯為碩士或副博士。錢鍾書以二年時間取得B. Litt.，1937夏至1938年9月中旬在法國巴黎大學進修一年。

<sup>43</sup> 同上引書，頁184-185。

<sup>44</sup> 戎一生：《錢鍾書先生生平述略》，《錢鍾書研究采輯》，頁392-398。

表大會代表、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等職。<sup>45</sup> 朱延豐，1937年取得英國牛津大學史學碩士學位，曾任教於德國波昂大學，返國後，歷任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四川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及中華民國首屆立法委員等職。<sup>46</sup>

根據上項資料得知：第三屆 11 名有傳記資料者，全數自英國取得學位，計共 7 名博士、3 名碩士、1 名副博士（錢鍾書）。這 11 名學生畢業後，6 名任教職，1 名（柯召）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4 名任公職（其中朱延豐為中華民國首屆立法委員）。

第四屆留英公費考試於 1936 年 4 月舉行，計錄取樓邦彥、李浩培（法律），羅鳳超、黎名郁（經濟），許寶騶、張宗燧（算學），任美鏞、李旭旦（地理），胡啟勳、黃克維（理論醫學），賴寶勤小姐（英語學），王繩祖（西洋史），周長寧（物理），翁文波（地球物理），吳徵鎧（化學），朱壬葆（生物），王自新（機械工程），俞調梅（土木工程），李登科（航空工程），辛一心（造船）等人，共 20 名。<sup>47</sup>

本屆較有成就者包括：李浩培，1939 年自倫敦政經學院取得法學碩士學位，之後歷任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法律系教授、法學院院長，1949 年任國民政府大法官，及中國中央法制委員會專門委員等職。許寶騶，1938 年後取得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及科學博士學位，並於 1940 年返國服務，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48 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後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化學部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張宗燧，自劍橋大學物理系畢業後，於 1940 年返國在重慶中央大學任教，1945 至 1947 年間在英、美兩國從事研究工作，1948 年冬回國任教於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之後被選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等。翁文波，1939 年取得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回國後重慶中央大學執教，旋赴玉門油礦任工程師，並在中國擔任石油工業部石油地質研究所所長、石油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等職。任美鏞，1939 年取得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博士學位，歷任浙江大學、復旦大學、中央大學教授，及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等職。朱壬葆，1938 年取得英國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39 年赴成都金陵大學農學院籌建畜牧獸醫系，後曾任教於中央大學、上海醫學院，及任上海醫學院工會

<sup>45</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 99、404、555、863、908、1150。

<sup>46</sup> 國史館編：朱延豐先生行狀，《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13 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84 年 2 月，初版），頁 30-32。

<sup>47</sup> 《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頁 207；中英庚款董事會（民國 25 年 5 月 11 日），《教育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97/116 留參 1，檔案原件；“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AIFBG for the period Jan.-Dec., 1934”，owned by the Wason's Library of Cornell University.

主席，軍事醫學科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李旭旦，1939年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理學碩士學位，同年返國，歷任重慶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及系主任，南京師範學院地理系主任，中國科學院地理專業籌委會會員，曾任《地理知識》雜誌主編，及德國《地學》雜誌通訊編輯等職。王繩祖，1939年自英國牛津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回國，歷任金陵大學、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及文學院院長，1964年任南京大學近現代史、英美對外關係研究室主任，及中國國際關係史學會會長等職。<sup>48</sup>

根據以上8名留英公費生的資料得知：第四屆8名學生皆自英國取得學位，計共4名博士（許寶騶取得哲學、科學雙料博士學位，但僅算為1名博士）3名碩士。畢業後3名任教職，3名（許寶騶、張宗隧、翁文波）獲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級），2名任公職（其中李浩培任國民政府大法官）。

因此，第一至第四屆公費生的學經歷可分析如表五。

表五：第一至第四屆留英公費生學經歷分析

屆數 / 學經歷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總計	百分比
錄取總人數		9 人	26 人	24 人	20 人	79 人	100%
考試時間		1933 年 8 月	1934 年 7 月	1935 年 4 月	1936 年 4 月		
有記錄可查者		4 人	15 人	11 人	8 人	38 人	48%
取得學位國別	英	4 人	7 人	11 人	8 人	30 人	37%
	德	無	3 人 (不詳者 5 人)	無	無	3 人	3%
取得學位別	博士	2 人	5 人	7 人	4 人	18 人	22%
	碩士	無	2 人	3 人	3 人	8 人	10%
	不詳者	2 人	8 人	1 人(副博士)	1 人	12 人	15%
就業情形	教職	3 人	6 人	6 人	3 人	18 人	22%
	公職	無	7 人	4 人	2 人	13 人	16%
	院士級	1 人	1 人	1 人	3 人	6 人	7%
	不詳者	無	1 人	無	無	1 人	1%

換言之，抗戰前所考選之四屆留英公費生中，取得博士學位者約占總錄取人數的22%，碩士占10%。返國後，多數任教於大學院校，約占總錄取人數的22%；任公職者（指任職於學術單位、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或擔任政府職務者），約占16%。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四

<sup>48</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110、187、217-218、270、290-291、834-844、935。

屆留英公費生中，為國家培養出6名中央研究院院士級（中國科學院學務委員相當於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占總錄取人數的7%。另外，如有臺灣科技之父之稱李國鼎，領一代文學風騷的錢鍾書，中華民國首屆立法委員朱延豐，及國民政府大法官的李浩培等人，亦值得我們注意。

#### 四、對教科書的支持

關於中小學教科書及專門著作之獎勵，中英庚款會曾於1934年10月，設置民眾教育讀本、小學樂歌及高小歷史教科書三種獎金，各4,000元。<sup>49</sup>經審查，結果計取民眾教育讀本2種、小學樂歌55首、高小歷史教科書部分來稿未臻完善僅擇4種。1935年10月，復設置初中史地教科書獎金各6,000元。1936年6月，中英庚款會決議以第四類息金28,000元，設置專門著作獎金。<sup>50</sup>

#### 五、對各教育機關的挹注

中英庚款會對於各教育機關的補助所涵括之項目較多。例如：

一、補助中小學、職業學校及農村教育部分：歷年來因湘、鄂、皖、贛、閩五省特種教育的迫切需要，占用了本項大部分的經費，以1934年為例，當時對特種農村教育的補助經費曾高達1,600,000元。

二、為兼顧西北各省義務教育、助產教育、農工職業學校方面。1.對於西北各省義務教育的補助：1934年中英庚款會補助寧夏、青海省政府建設小學經費12,000元；1935年補助青海省政府，建設蒙藏小學經費達14,500元；1936年補助甘肅、寧夏、青海、綏遠省政府，共200,000元。由此可見，本項補助大部分用於西北，西北之中又以甘肅為最。<sup>51</sup> 2.助產教育方面：1935年中英庚款會補助陝西省政府，建設西京助產學校10,000元，浙江、江蘇、甘肅、陝西省立助產學校、湖北省立醫院附設助產人員訓練班，各10,000元。及抗

<sup>49</sup> 本國教育文化史的新頁，《教育雜誌》，24卷4號（民國23年12月10日），頁116。

<sup>50</sup>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2；《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頁207-208。

<sup>51</sup> 《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頁213；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1919-1949）》（北京：新華書局，1988年12月，初版），民國25年9月9日條。

戰開始時，已經補助14所省助產學校，但有幾省因為戰事關係並未動用取得的補助款項，改做其他用途。3.工業職業教育方面：曾與教育部和南京市政府合辦中央工業職業學校。4.農業職業學校方面：1936年起補助湖南私立修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30,000元。<sup>52</sup>

三、另案決議補助者：1935年，為推行甘肅、青海、寧夏三省省會之義務教育，曾撥予蘭州50,000元、青寧二省省會各25,000元。同年，為充實全國高中物理設備起見，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共同向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定製物理儀器100套，贈予滇黔桂綏察陝甘青寧等省、及海外華僑所辦之高級中學。<sup>53</sup>

綜而言之，抗戰前經中英庚款會資助開辦經費，使中央圖書館的藏書量成長了五倍；高等教育及研究機關，許多建築、設備、及講座得以設立；考送赴英留學的79名學生中，培養出18名博士、6名院士級人物，對於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功不可沒。

## 肆、抗戰期間對文教事業的資助

抗戰期間，因戰事影響各借款機關自行停止付息，致中英庚款會的息金收入銳減，該會各項事業推展因而備增困難。該會為適應戰時的需要，仍竭力依支配標準進行各項事業，歸納起來，可分為以下幾項：

### 一、保存古物方面

抗戰期間，中英庚款會對於古物古籍的資助，以搶運故宮文物、整理影印居延漢簡、深入淪陷區收購古書三事為主。

搶運古物方面。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威脅平津時，故宮已經計劃要將文物南運。1932年朱家驊掌教育部時，服膺中央的命令，負責主持文物南遷之事，文物遂移至上海、南京等地。<sup>54</sup>

<sup>52</sup> 王聿均、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399-406；《民國外債檔案史料》，第12卷，頁601-604。

<sup>53</sup> 《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頁36-37、213。

<sup>54</sup> 蔣復璁：朱駱先先生對中國文化教育之貢獻，《傳記文學》，29卷6期，頁12-13。

1937年抗戰爆發，八一三上海發生戰事，杭州緊急，當時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驊，陸續電請蔣委員長指示存放在南京朝天宮故宮文物的處理方策，後來電請唐生智設法安排交通工具，將故宮古物移至安全處所。為籌措搬遷費用，朱家驊藉兼任中英庚款會董事長之便，在符合該會贊助的規定範圍內，電囑中英庚款會的總幹事杭立武，撥用該會庚款息金當作搬遷經費。<sup>55</sup>

這次古物搶運計畫，分為水、陸兩條路線。陸路由軍事委員會調撥車輛，循津浦鐵路，轉隴海線至寶雞，再以卡車護運入四川，由故宮博物院之莊尚嚴、那志良協同負責搶運。水路方面，洽租英商輪船上溯長江運至漢口。再輾轉運到四川，分別貯藏在樂山、峨嵋等處。水路部分的搬運工作由楊師庚、中英庚款會部分職員暨故宮人員吳玉璋等協助搶運。搶運工作自1931年11月開始，到1939年4月才告完畢。終於將這批一萬七千餘箱的文物運到後方，寄存於貴州安順、四川樂山及峨嵋三地，並在此三地設置「辦事處」擔負保管之責。<sup>56</sup> 1945年抗戰勝利後，政府還都南京，三處文物又再度運回南京。

第二，關於整理影印居延漢簡乙事。居延漢簡的整理影印，淵源自二十世紀初。當時到中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古工作的外國人，一為英國人斯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一為瑞典人斯文赫丁（Seven Hedin, 1865-1952），經他們的努力，曾發現一批魏晉的古簡。

1926年10月間赫丁至北京，與北京學術界磋商，在1927年4月與中國合組西北的「科學考查團」。當時中國團長為徐炳昶，瑞典團長由赫丁擔任。該團原計畫於1933年夏結束考古計劃，但因中國政府再委託赫丁組織考查團，勘察西北公路路線，因此，西北「科學考查團」延至1935年春，始完全結束工作。此次中瑞合組之西北「科學考查團」中一名瑞典團員貝格曼（Folke Bergman），曾在1930年4月期間，於居延澤以南，發現了一萬餘枚的漢代木簡，是為出土古簡中最大的一批，使漢代史的研究得以另闢新徑，近人稱之為「居延漢簡」。<sup>57</sup>

<sup>55</sup> 胡頌平：我所知道的朱先生，《傳記文學》，29卷6期，頁36-37；杭立武：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頁30；「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第五次常會議紀錄」中央文物運臺聯合管理處章則規程，《教育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目錄194，卷43。

<sup>56</sup> 胡頌平：我所知道的朱先生，《傳記文學》，29卷6期，頁36-37；杭立武：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頁30；「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第五次常會議紀錄」中央文物運臺聯合管理處章則規程，《教育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目錄194，卷43。

<sup>57</sup> 李書華：近代出土的竹木簡，《大陸雜誌》，29卷10、11期合刊本（民國53年12月15日），頁344-345；張春樹：居延漢簡中所見的「牧土」，《大陸雜誌》，30卷9期（民國54年5月15日），頁273。

這次的發掘曾接受中英庚款會補助整理經費，但工作未竣而抗戰開始。徐鴻寶及沈仲章設法將古簡由平運滬，再由滬運港，因輾轉數千里，出土又已日久，朽損堪虞，故中英庚款會再次資助，交由商務印書館攝影製版，整理影印，方便保存。1940年於香港製成照片複本兩份，一份寄至上海製版，一份寄到昆明由勞榦作釋文。1941年12月正在進行中的製版工作，因香港被日軍攻陷而告停頓。<sup>58</sup> 繼因戰事激烈，交通受阻，無法將存放香港的居延漢簡內運中國大陸，為緊急處置計，中英庚款會乃洽請當時的駐美大使胡適，轉商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計共封裝 14 箱，漢簡乃暫存美國國會圖書館，以策安全。<sup>59</sup>

抗戰勝利後，原擬漢簡運回我國，與傅斯年等商洽後，認為局勢未平靖，故決定仍暫存美國為妥，1952年時，漢簡繼續保存於美國。1955年4月6日，中英庚款會決定將居延漢簡移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保管，供作研究之用。5月2日，經行政院同意而圓滿地了結此一懸案。<sup>60</sup>

第三，關於收購古籍乙事。抗戰軍興以後，淪陷區內公家及私人所藏善本書籍頗多散失，甚至有流往國外販購者。中英庚款會董事長朱家驊有鑒於此，指令該會策畫搜購事宜，所需經費就原定補助中央圖書館建築費未經動用部分，移撥應用，並委託徐森玉，在上海搜購後密運香港，再由香港空運重慶。今日保存於國家圖書館的珍本、孤本、宋本書籍等12萬冊，皆是該次搜購所得。<sup>61</sup>

## 二、對科學研究者的補助

當抗戰開始時，全國教育界普遍發生失業現象。北方各大學教授因學校停辦，導致生活

<sup>58</sup> 李書華：近代出土的竹木簡，《大陸雜誌》，29卷10、11期合刊本，頁346。

<sup>59</sup> 王聿均、孫斌合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405-406；對英事務雜卷（民國42年2月27日），《教育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563-1，檔案原件；中央研究院函（民國44年5月2日），《教育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96,261-6，團/拾壹2，原件。待考證其與民國31年之西北考察團之關係。

<sup>60</sup> 王聿均、孫斌合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405-406；對英事務雜卷（民國42年2月27日），《教育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563-1，檔案原件；中央研究院函（民國44年5月2日），《教育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96,261-6，團/拾壹2，原件。待考證其與民國31年之西北考察團之關係。

<sup>61</sup> 徐可燦：談庚款憶駟公，《傳記文學》，29卷6期，頁30；譚慧生：朱家驊與中英庚款會，《朱駟先傳記資料》，頁549；朱家驊先生傳略，《朱家驊先生逝世紀念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75年），頁4。

困難者多人，各處科學研究者也有許多人因機關緊縮而被遣散，應屆畢業的大學生的就業，更是困難。於是，中英庚款會辦理以下事務，以因應社會的需要。當時補助的教授學者，共計近七百人，<sup>62</sup> 補助的方式有三種：

- (一)在內地各大學（如雲南大學、重慶大學、廣西大學、四川大學、湖南大學）<sup>63</sup> 設置講座四十餘席，以容納北方一部分教授。在內地設置講座，一方面可安置南下的教授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使內地各校，得以充實幹部教授。
- (二)資助一般原有工作、後因戰事爆發被疏散的科學研究者。1938年4月，公布「協助科學人員工作辦法」。該項辦法規定：凡從事科學工作者，因故不能繼續研究者，得申請或由機關專家推荐，請求協助繼續研究。經審查合格者，每月津貼80至200元。<sup>64</sup>
- (三)設置科學研究助理。本項辦法在於補助大學應屆畢業、有志於科學研究工作的一般青年，使之得以安心於從事研究工作。中英庚款會先於1938年3月設立「科學協助制度」，籌設130,000元的專款，協助科學事業。協助範圍，包括自然及社會學科。當時請求協助者，達一千五百多人，經審查合格者，有一百八十多人。<sup>65</sup> 1939年2月，中英庚款會再決議在大學或研究機關設置科學研究助理125名。研究一年後，如有成績可繼續研究。

因為中英庚款會的支持協助，使得抗戰期間中國的科學研究工作，不致中斷，而能廣續進行，對於政府兼顧抗戰與建國的努力，得著經費上實惠的支持。

### 三、自辦事業

1937年春，中英庚款會決定每年指撥法幣200,000元，補助西北甘、寧、青各省的教育。為設計這筆經費的使用方式，董事會聘請一些學人擔任設計委員，前往上述各省作實際地考察。6月，該會聘請顧頡剛、陶孟和、王文俊、英人戴樂仁等組織「西北考察團」。該團出發時抗戰已然爆發，此團首先到達蘭州，次及青海，但並未至寧夏。1938年初，中英庚款

<sup>62</sup> 中英文教基金會呈請行政院核備結束保管處（民國47年3月17日），《朱家驊檔案》，中英庚款會，第82函，檔案原件。

<sup>63</sup> 譚慧生：朱家驊，《朱驢先傳記資料》，第1冊，頁549。

<sup>64</sup>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1919-1949）》，民國28年2月條。

<sup>65</sup> 中英庚款會補助科學事業，《教育雜誌》，28卷4號（民國27年4月10日），頁87；抗戰中英庚款會的工作，《教育雜誌》，29卷2號（民國28年2月10日），頁86；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1919-1949）》，民國28年2月條。

會董事長朱家驊接受「西北考察團」的建議，在蘭州設置「甘肅科學教育館」、在青海設立「湟川中學」、在酒泉設立「河西中學」。此議案著重於以基本教育入手，開發西北邊疆地區。<sup>66</sup>

當時的西北考察團，提供40名團員的名額，由專科畢業學生充任之，以協助專科以上的青年，學習實地考察的經驗。該團預定考察的地點，有西北、西南和川康三區。每區派一個考察團。西北區以甘肅、寧夏、青海三省為範圍；西南區以廣西、雲南、貴州為範圍；川康考察團以四川、西康二省為範圍。每團設團長、副團長各1人，科學專家5人至7人，醫生1人，幹事1人，團員40人。1939年1月，開始審查報名參加「川康考察團」人員的資格，並確定人選，春天即行展開研究工作。<sup>67</sup>「川康考察團」以武漢大學工學院院長邵逸周出任團長，團員41人，分地質、礦產、理工、經濟、社會及農村五組，分三期赴嘉定、康定、松潘考察，每期約考察二個月。<sup>68</sup>

1942年春，中英庚款會之中國地理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及其他學術機關，共同組成「西北史地考察團」。團長由辛樹幟擔任，李承三任總幹事，其下區分為歷史組、地理組及生物組三組。歷史組專家有勞榦、石璋如、夏鼐、向達；地理組有李承三、林超、周廷儒等人；生物組有吳印禪、單人驊二人。本次考察活動，勞榦在甘肅居延發現大量漢簡，石璋如則在敦煌工作，後轉往陝西涇、渭水、雍水三流域作遺跡考古。總之，此一考察團，對於歷史考古及地質方面的學術研究，極具價值與貢獻，不讓1927年由瑞典人斯文赫定所組成之西北科學考察團專美於前。<sup>69</sup>

除了上述的教育考察團、史地考察團之外，抗戰時期中英庚款會的自辦事業，還包括創辦「中國蠶桑研究所」、「中國地理研究所」、「甘肅科學教育館」、「中國美術學院」、「中國心理生理研究所」等五個機構，以及數個邊省中學。

中國蠶桑研究所成立於1939年，所址設在貴州遵義，首屆所長蔡葆。該所分為細胞與遺傳、生理、病蟲害及飼料四部，主要職掌為研究桑苗、桑秧之栽培，病蟲害之減少，蠶種之飼育改良，及土種之試驗。抗戰後，中英庚款會受會息金收入不敷所需的影響，改與教育部合辦。之後，所址遷移至杭州。<sup>70</sup>

<sup>66</sup> 胡頌平：《朱家驊先生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58年，初版），民國27年條；王文俊：《駱師與邊疆教育》，《朱家驊先生逝世紀念冊》，頁428-431。

<sup>67</sup> 抗戰中中英庚款會的工作，《教育雜誌》，29卷2號（民國28年2月10日），頁86。

<sup>68</sup>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1919-1949）》，民國28年1月條。

<sup>69</sup> 朱家驊先生與中央研究院，《朱駱先傳記資料》，第3冊，頁36-37。

<sup>70</sup>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2；周琇環編：《中英庚款史料彙編》，下冊（臺北：國史館印行，民國82年出版），頁405-406；王聿均、孫斌合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406。

中國地理研究所成立於1939年12月，所址設在重慶北培，首屆所長為黃國璋。1945年黃國璋辭職後，改由李承三代理。1946年，林超繼任。該所分人生地理、自然地理、大地測量及海洋學四組。主要職掌，為考察人生及自然地理，編製經濟地圖，研究歷史地理、大地測量及海洋水產。地理所後來遷至南京，所內原來附設的海洋學組，在抗戰勝利以後，由唐世鳳負責籌劃單獨設所，該所所址移至廈門，並與廈門大學合作。<sup>71</sup>

甘肅科學教育館成立於1939年1月1日，館址位於甘肅蘭州。成立宗旨為調查研究及推廣科學教育工作，製造理化儀器、生物標本，推進義務教育及化驗礦產等。首任館長梅貽寶。1941年梅貽寶辭職後，由袁翰青繼任。後來，因為經費困難，1944年8月時改隸教育部，更名為「國立甘肅科學教育館」。該館主要工作，為協助西北的科學研究與發展，包括製造科學儀器標本，舉辦教師講習班，編印通俗科學期刊及教育小叢書，對蒙藏同胞巡迴施教等。西北邊區在該館的擘劃與協助下，在社會的現代化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展。<sup>72</sup>

中國美術學院成立於1942年10月，院址設於重慶沙坪壩，院長為名畫家徐悲鴻。該院在成立之初，設有研究、陳列二部。抗戰勝利後，該院遷至北平，並與國立北平藝術專門學校合作辦學。<sup>73</sup>

中英庚款會為開發邊省的基本教育，曾在西北邊區各地設立自辦的中等學校。1938年9月起，分別創辦湟川中學於青海西寧，河西中學於甘肅酒泉，及黔江中學於貴州安順。<sup>74</sup> 湟川中學首任校長為王文俊，1944年7月教育部接收該校後，改組為「國立湟川中學」，校長仍是王文俊，1945年7月始改任劉鴻賓為校長，1949年結束校務。河西中學首屆校長為吳亮夫，後由張索繼任，1944年7月改隸教育部，1949年亦告結束。黔江中學首屆校長為曹芻，後由陳達夫接任，1944年9月改隸教育部，1946年由趙天河任校長，1949年亦告結束。<sup>75</sup>

最後一項自辦事業，為1940年中英庚款會應教育部之請，與教育部合辦的中國心理生

<sup>71</sup>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2；周琇環編：《中英庚款史料彙編》，下冊，頁405-406；王聿均、孫斌合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406。

<sup>72</sup>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2；抗戰中英庚款會的工作，《教育雜誌》，29卷2號，頁86；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1919-1949）》，民國28年11月條；周琇環編：《中英庚款史料彙編》，下冊，頁406。

<sup>73</sup>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Paper Regarding the Disposal of the British Share of the China Indemnity of 1901, Sep. 19-Nov. 14, 1930", China No.3 (1930)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30) pp.2-8.

<sup>74</sup> 河西中學及黔江中學成立於1939年。參見周琇環編：《中英庚款史料彙編》，下冊，頁406。

<sup>75</sup>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2；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61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61年12月出版），頁267-269。

理研究所，所長是郭任遠。<sup>76</sup>

## 四、公費留英

抗戰期間，中英庚款會考送留英公費學生的工作，並未中綴。但是此項工作，還是因為戰事的影響，使得幣值不穩，息金不足，以致無法年年舉辦。截至1946年止，總共舉辦了五次留學考試，就結束了留英試務。

1937年4月22日，經中英庚款會第五屆考試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第五屆留英公費生，錄取了譚楨謀、鮑覺民（以上地理），湯逸人、王棟（以上畜牧），顧兆勳、張維（以上水利工程），周家仁、陳彬（以上紡織），李佩琳、張昌紹（以上理論醫學），戴文賽（天文），馬仕俊（物理），盧嘉錫（化學），葉和才（農業化學），沈其益（植物病理），胡祥璧（獸醫），唐世鳳（水產），王兆華（機械工程），黃玉珊（航空工程），袁家驊（普通語言學），許煥光（社會人類學），徐毓柵（財政），程振粵（鐵路管理），徐鍾濟（統計），張天開（社會立法）等25名。<sup>77</sup>

第五屆較有成就者，大致包括：鮑覺民，於1937年9月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1940年獲得經濟地理學博士學位後，負笈返國。同年秋，擔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之後南開大學經濟系及所任教，1957年至1958年間任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等職。湯逸人，1939年於英國愛丁堡大學動物遺傳研究所畢業，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42年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畜牧醫學系教授，1947年赴美國華盛頓，任聯合國農糧組織畜牧專員，1950年春，入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教授、系主任。王棟，曾任貴州農工學院、西北農學院、中央大學等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南京大學、南京農學院等校教授，畢生從事於農業科學教育和草原管理，牧草及家畜營養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顧兆勳，1937年9月赴英國孟徹斯德大學研究，1940年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師中央大學水利系教授、南京工學院水利系教授、河海大學水利發電系教授等職。<sup>78</sup>

張昌紹，赴英留學後，先入倫敦大學醫學院進修，後入牛津大學參觀見習，1939年取得醫學博士與哲學博士學位，1941年返國，在四川重慶歌樂學山上海醫學院任教，兼任中央衛

<sup>76</sup>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2。

<sup>77</sup> 周琇環編：《中英庚款史料彙編》，中冊（臺北：民國82年6月，初版），頁311-316。

<sup>78</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27、428、575、652-53、724、755、930、1106、1110；卓遵宏訪問、陳進金紀錄：李國鼎先生口述訪問稿（民國85年9月6日上午訪問），未刊稿。

生實驗院研究員和藥理研究室主任。戴文賽，1937年赴英國留學，入劍橋大學學習天文學，1940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員及所長，燕京大學教授，1949年以後，任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教授等職。盧嘉錫，臺灣臺南人，赴英國倫敦大學化學系任研究生，1939年取得博士學位，1945年返國，歷任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福州大學化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華東物質結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長等職。沈其益，中央大學畢業，赴英國入倫敦大學皇家學院，1939年取得倫敦大學科學博士學位，1940年返國後，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後任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北京的中國農業大學校長等。<sup>79</sup>

胡祥璧，1940年畢業於英國皇家獸醫學院，任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教授，西北農學院獸醫組主任，1944年任農林部西北獸疫防治處技正兼代處長，1946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系教授，1949年至1979年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唐世鳳，1937年9月，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學習海洋學，並取得博士學位回國任職，1941年至1944年，任中國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員，歷任廈門大學生物系、海洋系教授，中國海洋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海洋系教授等職。黃玉珊，赴英國留學入倫敦大學，1939年獲得航空碩士學位，後入美國斯坦福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40年回國，任教於中央大學航空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華東航空學院、西安航空學院、西北工業大學教授，第七機械工業部結構強度研究所所長、西北工業大學飛機結構強度研究所所長。袁家驊，1937年初，赴英國牛津大學莫爾敦學院就讀，1940年回國，在西南聯合大學任語言專修科主任，抗戰勝利後，一直在北京大學教授語言。<sup>80</sup>

許烺光，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1941年獲得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歸國後，在華中大學和雲南大學任教，並在西北、西南從事文化人類學考察活動，1944年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和西北大學講授人類學，1970年代，當選為美國人類學會會長，1978年，任舊金山大學教育學院文化研究中心教授。<sup>81</sup> 徐毓柵，赴英國劍橋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曾任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教授。程振粵，英國留學於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抗戰時回國，歷任國立交通大學教授、湖北省交通事業管理處處長、任東南亞盟軍統帥蒙巴頓總部聯絡參謀，抗戰勝利後，任平漢鐵路北段運輸處處長等職。<sup>82</sup>

<sup>79</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27、428、575、652-53、724、755、930、1106、1110；卓遵宏訪問、陳進金紀錄：李國鼎先生口述訪問稿（民國85年9月6日上午訪問），未刊稿。

<sup>80</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1149、1188、1518-19、1536、1598-99、1675。

<sup>81</sup> 張瑞德譯、許烺光著：《文化人類學新論》（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民國68年初版），作者簡介部分；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840。

<sup>82</sup>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2。

根據以上15名留英公費生的資料得知：第五屆13名自英國取得學位、1名自美國取得學位，計共10名博士（張昌紹係雙學位博士）。畢業後13名任教職（許煥光曾當選為美國人類學會會長），2名任公職（臺灣臺南人盧嘉錫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程振粵任東南亞盟軍統帥蒙巴頓總部聯絡參謀）。

1938年舉行第六屆留英公費考試，計錄取20名，即王大珩、彭桓武（物理），黃用諷（算學），徐近之（地理），儲鍾瑞（測量製圖），鐵明（農業化學），張覺民（畜牧），朱樹屏（水產），寧梲、趙國華、史家宜（機械工程），張萬久、夏震寰（土木工程），盧煥章、璩定一（化學工程），王應暎（生物化學），王承緒（教育），謝志耘（歷史），陳仲秀（經濟），王顯湘（法律）。

其中較有名者：王大珩，1938年秋赴英國留學，1940年、1945年，獲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科學博士學位，1947年底回國，歷任雲南大學教授、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等職。徐近之，1938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教於中央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事歷史氣候研究工作，曾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員等職。朱樹屏，1941年獲得倫敦大學皇家學院博士學位，曾任英國南部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研究員，1947年回國，應聘為雲南大學生物系教授及中央研究院上海動物研究所研究員，之後，歷任山東大學水產系主任、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黃海水產研究所所長等職。寧梲，1940年獲得英國牛津大學碩士學位，1941年回國，後歷任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學院教授等職。夏震寰，1938年入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研究院學習水利學，1940年獲得科學碩士學位，並轉入美國愛荷華大學深造，1943年得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底回國，一直任教職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王應暎，1938年赴英國留學，入劍橋大學並取得博士學位，1945年回國，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生化教授，爾後，歷任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之高級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所長等職。王承緒，1938年入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1946年取得教育碩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教育系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教育顧問等。<sup>83</sup>

第六屆7名留英公費生的資料中，6名自英國取得學位、1名自美國取得學位，計共5名博士（王大珩係雙料博士）、2名碩士。畢業後3名任教職，4名任公職（皆係各研究機關的研究員）。

<sup>83</sup> 周琇環編：《中英庚款史料彙編》，中冊，頁319-338；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69、106-107、207、664、712、1091、1201。

第七屆留英公費考試，依慣例於1939年7月23、24日，在香港、上海、昆明、重慶四處同時舉行，<sup>84</sup>計錄取郭永懷、錢偉長、傅承義（以上物理），汪盛年、林慰楨（以上物理化學），張龍翔、沈昭文（生物化學），林家翹、段學復、曹隆（以上應用算學），李春芬、羅開富（以上地理），謝安祐、朱承基（航空工程），姚玉林、張祿經（冶金），易見龍（藥物學），宋杰（獸醫），曹飛、張孟休、歐陽子祥（教育），靳文翰、陳春沂、韓德培（法學）等24名。<sup>85</sup>

本屆中較著名者：郭永懷，於1940年9月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獲得碩士學位，轉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深造，並於1945年獲得博士學位，1946年受聘為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院教授，1956年11月，任中國科學院研究所副所長，並曾任中國科技大學化學物理系教授。錢偉長，亦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就讀，1942年獲得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教於清華大學，之後歷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等，在力學界有十分重要地位。傅承義，1941年得到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物理學碩士，1944年取得美國加州理工大學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系主任，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級研究員等職。段學復，於1940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數學系為研究生，1941年取得碩士學位，同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1943年獲得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後，歷任北平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教授等職。李春芬，1939年赴英國留學，次年轉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地理系，1943年獲得加拿大在地理學科中授予之第一個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任浙江大學史地系地理組教授，1952年調任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其間又任河口海岸研究室主任、西歐北美研究室主任等職。韓德培，初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研究法學取得碩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武漢大學教授、國際法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法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顧問等職。

第七屆6名留英公費生的資料中，3名自美國取得學位、3名自加拿大取得學位，計共5名博士、1名碩士。畢業後5名任教職，1名任公職。值得注意的是錢偉長回國後，在中國的力學界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受到歐戰的影響，第八屆留英公費考試暫緩，延至1943年春間，經中英庚款會第五十三次董事會決議繼續舉辦，並定於1944年2月16日至18日在重慶、昆明、桂林、泰和、成都、西安六地同時考試。本屆共錄取28名留學生。包括劉培德、趙佩之（機械工程），李文雄（水利工程），楊琳、張沛霖（冶金），楊詩興（畜牧），劉建康（水產），王正憲、黎祿生、

<sup>84</sup> 中英庚款會設立師範及招考，《教育雜誌》，29卷6號（民國28年6月10日），頁92。

<sup>85</sup> 周琇環編：《中英庚款史料彙編》，中冊，頁357、396-397。

陳舜禮（經濟），程振球、劉家驥、楊敬年（法律），徐春霖（教育），梅鎮岳、黃昆（物理），程京、閔嗣鶴（算學），張阿舟、王培生（航空工程），朱曉屏、朱宣人（獸醫），熊文愈（森林），李昌甫（藥物學），朱既明、蘇德隆（公共衛生），曹日昌（實驗心理）等人。<sup>86</sup>

第八屆僅知黃昆於1945年8月入英國柏雷斯托爾大學就讀，1948年1月獲得博士學位，並受聘於英國利物浦大學理論物理系任研究員，1951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第三屆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所長等職。<sup>87</sup>

第九屆留公費生考試則於1946年舉行，計取17人，包括王佐良、白純瑜（英國文學），戴傳曾、李天慶（物理），湯宗舜（法律），陳志讓（經濟），陳季光、錢榮堃（保險），鄒承魯、嵇汝運（生物化學），周孝達、張沅昌（神經病學），陳安磐、周則巽（紡織），連孟雄（造船），楊南生、支德瑜（機械工程）等。<sup>88</sup> 本屆留學生的學經歷如何，對國家的貢獻多少，需待相關資料出土後再予補充。

受限於資料，本表初步分析第五至第九屆的留英公費生之學經歷如次。

表六：第五至第九屆留英公費生學經歷分析

屆數 / 學經歷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共計	百分比	第八屆	第九屆	總計
錄取總人數	25 人	20 人	24 人	69 人	100%	28 人	17 人	114 人
考試時間	1937 年 4 月	1938 年	1939 年 7 月			1944 年 2 月	1946 年	
有記錄可查者	15 人	7 人	6 人	28 人	40%	1 人	不詳	
取得學位	英	13 人	6 人	無	19 人	27%	1 人	不詳
	美	1 人	1 人	3 人	5 人	7%	不詳	不詳
國別	不詳	1 人	無	加拿大 3 人 不詳 1 人	4%	不詳	不詳	
取得學位	博士	10 人	5 人	5 人	20 人	28%	1 人	不詳
	碩士	無	2 人	1 人	3 人	4%	不詳	不詳
別	不詳	3 人	無	無	3 人	4%	不詳	不詳
就業情形	教職	13 人	3 人	5 人	21 人	30%	不詳	不詳
	公職	2 人	4 人	1 人	7 人	10%	1 人	不詳

<sup>86</sup> 文教補助、公費生雜支，《朱家驊檔案》，附件二，中英庚款會，第42、44函；《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3。

<sup>87</sup>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1096。

<sup>88</sup> 公費生雜支卷，《朱家驊檔案》，檔號：附件二，中英庚款會，第44函；《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5編，雜錄，頁83。

由此可知，抗戰後第五至七屆有資料可查的 28 名留英公費生中，有 20 位取得博士學位。返國後出任教職者 21 人，任研究員等公職者 7 人。最特出者，包括第五屆錄取之臺灣臺南人盧嘉錫，他曾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乙職；許烺光曾當選為美國人類學會會長；第七屆錢偉長在中國力學界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 伍、結 論

英國庚款的文教事業，多是在換文的規範下，配合政府政策而訂定，不同於德奧俄法庚款之為政府所用者，是為國民政府可資運用的建設基金之一。該會業務上，多受朱家驊個人特色影響，如對中央圖書館的贊助，西北的開發，古物的遷運等，乃至該會最後的經費悉數贊助中央研究院等，皆因朱家驊任職之便，而完成之事業。

儘管如此，中英庚款會的文教事業，對於抗戰前後的貢獻，仍有足為後人稱述者。例如：一、留英公費考試方面。中英庚款會前後舉辦九次留英公費考試，共選派 193 名留學生。這些留英公費生中不限男性，亦錄取女性的學生，如第一屆的李祁、第二屆的何琴蓮、俞大綱、第四屆的賴寶勤等 4 名。不限省籍，第五屆盧嘉錫是臺灣臺南人。不限留學國家，舉辦第二屆（1934 年）公費留英時，因英國大地測量學的設施不足，有 3 人轉往德國學習取得學位。1937 年以後的第五、六屆，仍以留英國為主，但也有少數留美者。1939 年的第七屆留學生則以留美國與加拿大各半。

留英學生修習的科目，則數理、法商、工程、醫學、文藝無所不包，並培養出許多各學科中的佼佼者。在政界，如臺灣科技之父李國鼎、中華民國首屆立法委員朱延豐、國民政府大法官李浩培等。學術文化界，包括文學巨人錢鍾書、中國科學院院長（臺南人）盧嘉錫、美國人類學會會長許烺光、中國力學大師錢偉長等。另外有 6 名院士級人物 王葆仁、錢臨照、柯召、許寶騶、張宗燧、翁文波，及 3 名雙料博士 許寶騶、張昌紹、王大珩等人。

留英試務方面。自 1933 年至 39 年每年都舉辦考試一次。第八屆開始受大戰爆發，國無寧日，中外幣制變值而息金不足等因素的影響，導致試務無法年年舉辦。第八屆留英考試延遲了四年於 1944 年才舉行，1946 年舉辦最後一屆考試後，留學試務即行停辦。

其次，戰時中英庚款會曾致力於補助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建築費和設備費；安頓戰時流亡的科學研究人員及大學教授；搶運古物及在淪陷區搜購善本書，使文物不至流失國外；配合國家政策致力於西北開發等。這些工作對於安頓學者生活，維持戰時教育文化工作不致中

綴，有極大的貢獻，特別是對於西北的開發、我國的考古發掘工作、古書的蒐集保存、故宮古物的遷運等等挹注尤多。

因此，《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認為中英庚款會所舉辦的各項文教事業，是各國庚款會中收效最宏者。研究朱家驊生平行誼的學者們，亦多稱述他在主持中英庚款會期間，所興辦的各項文教事業，對國家社會貢獻良多，功不可沒。若不是在戰亂軍興，息金收入作業系統失效，相信以朱家驊的戮力從公、長於執行、積極任事，對於各項文教事業之推行，必有更可觀的成果。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文件、史料

#### 《朱家驊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附件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

檔號：第4函，本會會務摘要。

第20函，庚款會半年刊。

第42函，文教補助。

第44函，公費生雜支。

第81函，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歷年財務概況。

第82函，中英文教基金會呈請行政院核備結束保管處。

#### 《教育部檔案》(國史館藏)

檔號：197/116 留參1，中英庚款董事會。

檔號：194/43，中央文物運臺聯合管理處章則規程。

檔號：172,563-1，對英事務雜卷。

檔號：196,261-6，團/拾壹2，中央研究院函。

#### 《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

檔號：0882.10/0047.01-03，庚款用途劃撥。

朱傳譽編，《朱騷先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民國68年。

沈雲龍主編，《朱家驊先生紀念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75年。

杭立武先生治喪委員會編，《杭立武先生紀念集》。臺北：杭立武先生治喪委員會，民國81年3月。

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藏，《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民國14年7月至25年10月。

Cornell University owned, "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demnity Funds Remit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r the Period Jan. 1 to June 30, 1936. "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 Paper Regarding the Disposal of the British Share of the China Indemnity of 1901, Sep. 19-Nov. 14, 1930 ",China No.3 (1930)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30)

## (二)報紙期刊

《大公報》，天津，民國19年。

《大陸雜誌》，29卷10、11期合刊本；30卷9期。

《國聞週報》，7卷47期，民國19年。

《教育雜誌》，23卷10號、24卷4號、26卷9號、28卷4號、29卷2號、6號。

《傳記文學》，29卷6期。

## (三)專書論文

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9年8月臺二版。

王聿均、孫斌合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6年5月。

王煥琛編，《留學教育 中國留學教育史料》。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69年7月。

王樹槐，《庚子賠款》。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4年5月，再版。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1919-1949）》。北京：新華書局，1988年12

月。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53輯，民國60年12月；第61輯，民國61年12月。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周琇環，中英庚款的退還與運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87年6月。

周琇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史料選輯，《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4期（臺北：國史館，民國82年6月）。

周琇環編，《中英庚款史料彙編》，中冊、下冊。臺北：國史館印行，民國82年6月。

邵爽秋編，《庚款興學問題》。上海：教育部編譯館，民國24年4月。

胡頌平，《朱家驊先生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58年。

秦孝儀編，《中國現代史辭典》。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4年6月。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民國外債檔案史料》，第12卷。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

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臺北縣：文海出版社翻印，民國75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1輯，第15編，雜錄。

張瑞德譯、許焯光著，《文化人類學新論》。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民國68年。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9輯，臺北：國史館，民國82年6月。第11輯，臺北：國史館，民國83年5月，初版。第13輯，臺北：國史館，民國84年2月，初版。

陸文虎，《錢鍾書研究采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92年11月第1版。

康綠島，《李國鼎口述歷史》。臺北：卓越文化公司，民國82年9月，初版。

湯晏，《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民國90年，初版。

卓遵宏訪問、陳進金紀錄，李國鼎先生口述訪問稿（民國85年9月6日上午訪問），未刊稿。該次訪談筆者亦在場。